

王重民著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

中華書局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ly78/27 王重民 著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王重民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1.18印张·259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65 定价: 1.65元

前 言

王重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八年了。八年前，他含冤逝世。当时正值我带学生外出实习。四月归来后，突然得此噩耗，感到十分悲痛。

去年，受师母刘脩业先生委托，现将先生有关中国目录学史遗著编辑成书。这无论对先生或学术界，都是义不容辞而应该做的事。

经过选编，收入本书的，主要是 1962 年先生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授中国目录学史课程所写的讲义。书稿只写到宋末元初。为其完整，使读者能全面看到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见解与研究成果，我搜集了先生历年来所发表的目录学史论文，选择了六篇，补充列于后面。这些论文是：《〈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千顷堂书目〉考》、《〈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论〈四库全书总目〉》、《章学诚的目录学》以及《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又根据书稿内容，并征得刘脩业先生的同意，定名为《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书中所收著作，有已发表的，也有未发表过的，经过校订，某些地方作了删略，一些字句作了必要的改动。在先生诞生八十周年之际，谨将它献给先生，以为纪念。

王重民先生，1903 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原名鉴，字有三，自号为冷庐主人。现名乃 1924 年因直隶省军阀曹锟下令通缉时改用的。

1921 年进保定直隶（今河北省）第六中学读书。1923 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

师范大学)后,受业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诸先生,专心致志于文史。平时喜读古籍,研究国学,并注意整理中国古典文献。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早在他毕业前就曾在北海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工作过。毕业后至河北大学任教只一年,仍回北海图书馆工作,直至1934年。1933年9月至1934年6月还兼任过辅仁大学讲师。这一期间,他整理了李越缦著述,研究清代学者辑佚成就,主持或参加书目、索引的编辑工作。

1934年,派往国外,先生历游法、英、德、意、美各国著名图书馆。着重搜集与研究敦煌遗书、太平天国文献、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士的译述以及中国古籍善本。或抄录、复制,或著文介绍,撰写提要,编辑善本书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年归国。先生回到北平,仍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主持该系图书馆学组教学与行政工作。

北平解放后,先生深感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急需发展。为了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在他的建议下,北大先设图书馆学专科,后改本科,他担任主任,并兼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职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西郊北大新址,辞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集中精力,主持图书馆学系工作。

1956年,全国召开了制订《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先生参加了这一盛会。在他的主持下,也相应制订了图书馆学发展规划,促进了全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先生是一位热诚的教育家,坚持教学数十年,直至逝世前夕。他平易近人,对学生、青年教师,循循善诱,启迪他们以治学门径。为了办好系,他依靠党的领导,多方呼吁,从争取经费、购置图书、聘请教员以及制订教学计划,充实教学内容,无一不亲自动手,团结全系同志,做好工作。他对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建设与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学术研究领域宽广，在历史、古典文学、敦煌学、方志学、太平天国文献、欧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古籍及其版本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专门著述。尤其对于目录学研究，造诣极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先生著述繁富，有专著、论文 160 余部（篇）（见附录：《王重民著述目录》）。属于目录学方面的，已发表或出版的著述，主要有：《老子考》、《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柏林访书记》、《罗马访书记》、《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七志〉与〈七录〉》、《关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的〈玉海·艺文〉》、《〈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千顷堂书目〉考》、《〈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论〈四库全书总目〉》、《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章学诚的目录学》、《中国的地方志》、《敦煌古籍叙录》、《中国目录学史料（1—6）》以及数十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的题跋与书刊论文索引。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善本书提要》、《〈校讎通义〉通解》以及凝聚了他对于目录学史研究成果结晶的本书《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此外，还有几种为图书馆学系学生讲课用的讲义。

先生强调，从事目录学史研究，不可忽视书目工作实践。正是由于他编写了大量的古籍序跋、题记、提要与书目、索引，因而使他研究目录学史有着坚实的基础。

先生主张，从事目录学史研究，要通晓历史、学术史、思想史，注意开展目录学以外学科的研究。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而且取得成就，所以他的目录学史著作，有着学术的深度。

先生指出，从事目录学史研究，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从专题研究入手。他对古籍虽然了如指掌，但他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之

前,还是先编史料。在掌握丰富的文献和实际材料以后,他又总是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写出文章。本书《中国目录学史》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因而内容比较扎实,更具有科学性。

先生有关中国目录学论著不同于前人或同时代诸家著述之处,就在于他十分注重联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古籍的实际与社会学术思想去论述各个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把目录学放在整个社会中去考察,就比较能清晰地说明目录学史诸现象的原因与影响。他早期比较注意利用历史考据方法去研究学问,有他独到之处。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较多地在研究中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力求科学地反映目录学发展进程,研究更接近历史真实。书中对古代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以专文或专节加以阐述与发挥,正反映了他的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取得新的进展。

他根据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出我国目录学萌芽于殷商时代,形成于汉代。他根据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教育、图书、目录的发展,提出中国目录学史分期的六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汉末年为古代上古时期、东汉至隋为古代中古前期、唐宋元为古代中古后期、明清至鸦片战争为古代近古时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为近代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时期。

他十分重视古代目录学理论著述的研究,善于从书目总序的字里行间,发掘与阐述古代目录学家的精辟论断,给人以启发。

他研究历代目录学家,总是联系他们一生活动与学术成就进行评述,做到恰如其分。

他系统评介历代古典书目名著,既对书目的体例、源流发展,书目学术内容与编辑方法,作了仔细的分析;又从书目各自的价值与影响,也历史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

他综观历代公私家书目,从理论上总结了各个时期图书著录、

分类、类序、提要诸方面的特点与经验。提出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就在于强调类例，注重提要，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贯穿其中。

他不但精于古代目录学史，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搜集资料，也曾注意开展近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在《普通目录学》讲义中，初步勾划出轮廓，提出了问题，並作了有益的探索与论述。

先生一生道路坎坷，但在学术研究上勤奋感人，使我们受到鼓舞与鞭策。他治学严谨，对目录学有很深的研究与系统而精辟的见解。但是他始终谦克自抑，从不事夸扬。现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连同其它著作，在先生逝世以后陆续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在编校本书的过程中写下了这些话，既是向读者介绍先生及其目录学史研究成就，也是用以表达对已故老师深切的追思。

在编校本书时，崔文印同志给予很多帮助，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签，顾廷龙先生为本书撰写了跋，谨此一并致谢。限于个人水平，错误难免，请读者指正。

朱天俊

一九八三年四月于北大蔚秀园

目 录

中国目录学史（先秦至宋末元初）	（ 1 ）
第一章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生、发展和系统 目录的建成	（ 2 ）
第一节 我国目录学产生在奴隶社会时期	（ 2 ）
第二节 我国目录学在孔子校定六经和战国百家 争鸣时期的发展	（ 5 ）
第三节 系统目录的建成	（ 13 ）
第四节 《七略》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对后世的 影响	（ 28 ）
第二章 古代中古前期我国图书目录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	（ 33 ）
第一节 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 34 ）
第二节 东汉西晋的官修目录与《汉书·艺文志》	（ 38 ）
第三节 南北朝的官修目录	（ 47 ）
第四节 《七志》和《七录》	（ 53 ）
第五节 专科目录	（ 68 ）
第六节 目录学方法理论的发展	（ 75 ）
第三章 古代中古后期我国图书目录事业的发 展和繁荣	（ 80 ）
第一节 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 82 ）
第二节 《隋书·经籍志》	（ 88 ）
第三节 官修目录	（ 96 ）

第四节	史志目录	(105)
第五节	私人藏书目录	(113)
第六节	专科学目	(124)
第七节	指导阅读的学习书目	(130)
第八节	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	(138)
第九节	郑樵的《校雠略》和这一时期内目录学理论方法的发展	(163)
	《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	(171)
	《千顷堂书目》考	(185)
	《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	(213)
	论《四库全书总目》	(225)
	章学诚的目录学	(255)
	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	(277)
	附录：王重民著述目录	(319)
	跋	顾廷龙 (341)

中国目录学史

(先秦至宋末元初)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即公元前第一世纪的末年)又建成了第一部系统目录。在图书目录事业的整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把整理图书和编目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整理图书、校定新本是为了编制目录。编目是为揭露图书内容，系统的介绍文化典籍。在这种工作方法的紧密配合下，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书目录资料。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利用并批判地继承这一份文化遗产，在今天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发展范畴和历史，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变化中都反映着自己的本质，也就是它的阶级性。目录学当然也是一样。目录是著录、揭露和评论图书的工具，是宣传图书和考查图书的工具。目录学就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目录和目录学都是以著录和研究图书为对象。图书、目录和目录学都是属于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之内的东西，它们具有昭然若揭的阶级性。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才能批判地继承这一份文化遗产，才能发扬它的优良传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第一章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生、发展和系统目录的建成

第一节 我国目录学产生在奴隶社会时期

目录学的产生是在积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和图书以后。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考古学上的证明，我国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史官们把纪录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图书、文献都集中保藏。为了检查和使用上的方便，他们排列在一定的次序上，编定出相适应的数码，逐渐得出了固定的方式和规律，并且另外编成单据，这就产生了简单的著录图书文献的目录。这就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胚胎时期。这一时期约为公元前第十五、十四世纪，即我国历史上的殷商朝代。

我国历史上的殷商朝代已经是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时期。自从近六十年来甲骨文的大量发现和研究，使我们对于那时候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从而对于他们保存历史文献的方法和方式，也有了更多更具体的认识和研究。

根据甲骨文的纪录，殷商时代农产作物的品种已经相当丰富，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祈年”的记载，这反映着奴隶主们对于农业是极其重视的。与此同时，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殷墟不但发掘出了很多精美的手工艺品，还发现了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的遗存，都是奴隶主为供给他们的奢华、浪费、寄生的生活而设置的。在奴隶制社会里，农业奴隶和手工业奴隶是社会经济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财富。

殷商王朝是奴隶主统治阶级所建成的国家机器，它有军队，有

监狱,有管理国家政事、压迫和监督奴隶生产的百工(官),其中包括巫和史。

巫史是奴隶在劳动创造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中所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人。他们逐渐把奴隶创造出来的文化(如文字和纪录文献的方法和材料等)集中了,掌握了,便被奴隶主选拔出来,用文化来为奴隶主阶级服务。从此,巫吏成了世袭的有文化的人。他们在百工中参加国家的政治,掌管占卜和文献纪录等工作;史官还掌管着保存文献和图书的工作。

根据殷墟的发掘报告,出土的每一个穴窖里的甲骨都有一定的年代,经常是以一个帝王在位的时期为断限,也有极少数是包含着几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混合穴窖。所以一个穴窖内甲骨的入藏、陈列和参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续。我们现在看到有些甲骨的尾或背上,刻有“入”“示”和一些数码,就是主管保藏的人所做的记号,而这些记号和数码,应该都是与另外简单的单据或目录相适应的,这些都表示着目录参考工作的实际意义。至于那些记号和数码的正确意义和使用方法,虽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可是这里包含着目录工作的雏形,代表着我国古代目录工作的起源,则是可以肯定的。

象《尚书》中《盘庚》那样较长的历史文件,是否也刻在甲骨上,也和贞卜文字一起藏在穴窖里,我们还没有在甲骨的发掘中得到证明。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劳动人民的创造——在甲骨以外又发明了简牍,给图书文献创造了更有利的物质条件,同时也给史官与巫卜的分工,图书文献与贞卜文字的分藏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向。这时候,把一些写在简牍上的重要历史文献放在金匱里面,和鼎彝祭器同藏在宗庙或史官的官府,专由史官来保管,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元前第十一世纪的末年,周武王灭商。据《尚书·多士》,为



了使商贵族(顽民)服劳役,并且服从周王朝的统治,周公对他们讲了一段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很明显,周公所引据的那些典册就是用简牍写的,大概是灭商的时候从史官的官府里得来的。后来武王有了病,周公要代武王死,他向他们的祖宗神写了一篇很长的册祝辞,宣读以后藏在金匱里面,这就是《尚书》的《金匱》。这就更明显,《金匱》是写在简册上,藏在金匱里面,而又“緘之以金”的。可见殷周之际,即公元前第十一世纪的时候,一般重要历史文献和图书都是用简牍写的并且保存在史官的官府里面。但在贞卜方面仍然是用甲骨。这种分工,使史官的工作有更多的机会向着历史文献和图书方面发展,对于提高史官的历史文献地位和发展奴隶社会的文化事业和学术思想,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礼·春官宗伯》所载,大宗伯的属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它们的职掌都是和文化典籍有关系的。“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一个政府分设了这样多的史官,而它们对于文化典籍又各有专掌,周公为周王朝设官分职的时候,是不可能这样清清楚楚的规定下来的,而应该是在公元前第十一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到春秋末年约 550 年)周王朝和其他王国里,随着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需要逐渐演变出来的。大宗伯所统摄的这五种史官,并不是说为那一国所专有,而是总结了春秋之世(还包括着战国初年)各国史官的建设情况的。由此看来,奴隶制社会发展到了春秋之世将要崩溃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孕育并过渡到封建制社会的时候,政府的法典和文书是由史官掌管并有副本保藏着,从古代传来的旧书,外国的史书和本国的“四方之志”也是由史官掌管着。我国古代所谓“学术在官”,就是指的文化典籍专为史官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吏所掌

管。文化典籍不向外流通，一般人民是没有学习的机会，就是有些贵族要学习，也必须到史官那里去学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录学是没有机会向前发展的。但另一方面，春秋之世（公元前723年—477年）奴隶制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期，文化典籍的积累和保藏更加丰富，目录的编制和利用也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文献纪录，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发展程度（汲冢出土的竹书就有十万多简，一个诸侯王国太史所保管的必然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已经有着通过目录宣传图书的意义。但目录的功用能够发展到这样程度的时候，恐怕不在春秋之世，而是战国初年的事情了。在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产生了“士”或“儒”的一个阶层，他们把文化典籍和教育事业向着比较广泛的范围去扩展，从而把目录学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 我国目录学在孔子校定六经 和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发展

在奴隶制社会时期，由于奴隶主的剥削，社会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文化典籍的发展也是极其缓慢的，随之目录学的发展也就更缓慢了。这是由于目录学是以文化典籍为研究的对象，必须有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阶级斗争中、在学术思想的辩论中、在图书文献的整理和宣传的实践中，才能促进目录学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学术在官，文化典籍掌管在史官的手里，没有什么流通，目录学就很难有什么发展。只有到了奴隶制崩溃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奴隶的解放，阶级的分化和“士”阶层的产生，文化教育才能有比较广泛的扩展，文化典籍也就有了比较广泛的需要，而且目录学的作用也就愈加显著，这是目录学

发展史的规律。

殷商旧典和周公为周王朝制定的一些礼法都保藏在周太史和东方的几个较大的文明的诸侯王国的史官官府里。东迁的时候，周王朝所藏的散失了一部分，到了春秋末年，就以鲁太史所藏的最为丰富，最为完备了。公元前 541 年，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去聘访，“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左传·昭公二年》）。此外，作为殷后的宋国，夏后的杞国，以及齐、晋等较大较古的诸侯王国，也都藏有一定的文化典籍。在“士”阶层形成以后，这些掌管在史官官府里面的文化典籍，都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孔子是新兴“士”阶层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思想是站在新兴的领主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并且代表“士”阶层的需求，采集了鲁国和周宋等国保存下来的古代图书文献，在授徒讲学的过程中，删取了其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作为学生的读本。孔子在删取、编定和解释六经的时候，创造性的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

孔子在删定六经，教授生徒的过程中，对于六经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和解释，由他和他的弟子们给一经（如《易经》）或一经中的各篇（如《尚书》、《诗经》）做出了必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称说的大序和小序。这种大序和小序对读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所以六经经过这样的整理和修订，在鲁国和其他诸侯王国就逐渐成为公用的读本。孔子的弟子们又继续传授六经，形成了儒家学派。他们又继续修订、补充，并且更多地发挥了大序和小序的作用。

当儒家学派形成以后，代表其他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思想利益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和儒家及他家互相敌对，互相辩论，这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新时代。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是我国封建制社会将要建成的时代，这时候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是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迅速的，诸子

百家学术思想的变化和进步也是很大、很快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在变化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但阐述古代的图书文献，还用自己的论点来著书立说，这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称为私人著述开始的时期。诸子百家学派各自著书立说，并且大力宣传自己学派的学说和著述；他们把儒家学派校书的大序和小序，改变成为阐述和宣传自己著述的自序。自序的形式更便于揭露、评论和宣传图书。孔子学派校书的大序和小序，诸子百家宣传自己著述的自序，都是在阶级斗争和学术思想辩论中以宣传图书著作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是在系统目录建成以前发展阶段中的重要发展形式。

六经中，《易经》的《序卦》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叙录，《书经》和《诗经》的小序是说明各篇“作意”的叙录。旧说书序是孔子作的，诗序是子夏承接着孔子的传授，和毛公等人同作的。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根据，但说是孔子学派在整理六经，传授六经的过程中逐渐积累逐渐编写出来的，是比较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书序和诗序用极简明的文句，给每个历史文件，每首诗歌的内容、背景和作意，揭示出读者应该注意的地方，作为阅读的指导，这就是目录的主要作用之一。如《书经》中《禹贡》原来是一部古代地理书，它的内容是按照全国（当时主要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薮泽的分布，记述各地方的土壤、物产和田地的等级，还记明按等级所交纳的贡赋和输送贡赋的道路，即交通。虽说是以大禹治水为历史背景，可是充分表现出了一幅封建的统一的中国的图象，所以绝不是战国以前所能有，这部地理书也就绝不是战国以前人所能做的。书序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仅仅十二个字的序文，也就揭露了《禹贡》的主要内容。虽说没有辨明著作的年代，那是为撰书序人的知识和年代所局限。